

# 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 复合化趋势\*

文少彪 王佳霖

**【内容摘要】** 近十年来，中东秩序碎片化和部分“脆弱国家”权力结构崩溃加剧了代理人战争在该地区的局部回潮。美国作为中东最大的域外干预方，积极推动代理人战争的复合化，呈现出作战交互化、代理关系网络化、冲突科技化、军事外包市场化四大趋向。美国通过与地区代理人进行资源与力量交换，联手推进多元地缘政治和安全议程。同时，美国通过多级控制链交织发挥作用，形成复合化的代理关系网络，以强化外部干涉的韧性和灵活度。此外，在科技因素驱动下，智能和虚拟形态的“高科技代理人”被美国引入中东的多维冲突中，极大地拓展了战争空间。美国还引入私营商业武装，使其成为代理人战争的“力量倍增器”，加深了军事外包的市场化。作为美国护持中东霸权战略的一部分，中东代理人战争复合化趋势不可避免。非对称、非常规冲突频发深刻改变了作战方式和战争形态，恐对中东“和解潮”构成持久影响。

**【关键词】** 美国中东战略 中东安全 复合代理人战争 多维冲突

**【作者简介】** 文少彪，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83）；王佳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5-0118-2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5007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170）和202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项目“管控困境与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41004576）的阶段性成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不断推进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试图摆脱困境，重新分配战略资源和回归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调整在大方向上如出一辙，即限制海外大规模用兵，结束“永久战争”（Forever Wars），集中精力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sup>①</sup>然而，美国在中东的“大进大退”影响地区权力结构，引发地区体系持续动荡及重组。2011年以来，中东脆弱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恐怖主义、极端暴力、教派冲突等乱象丛生。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家逐渐沦为多方力量混战的战场，成为21世纪的“多边影子战争”（multisided shadow wars）。<sup>②</sup>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等趁机扩大各自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美国对中东秩序的主导能力则相对下降。为应对中东战略收缩的影响，挽回在中东的巨额“沉没成本”，美国既难以一走了之，又不具备大规模重返的条件。在进退失据的困局中，美国对中东的介入不再以直接、高强度的战争形式出现，而是转向“轻足迹”（light footprint）和“幕后领导”，通过支持代理人力量进行竞争，试图以更低的成本和显示度维系其中东霸权。

自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地区分裂和国家结构崩溃的双重“碎片化”为代理人战争进一步向该地区渗透创造了条件。在地区体系层面，中东遭受脆弱性和结构性紧张，出现了长期的权力真空。在国家层面，一些中东国家的中央政府受到反对派或地方武装力量的挑战，没有能力恢复整体统治。碎片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为内外力量的勾连创造了条件，外部力量得以向动乱国家渗透，并轻易将目标国的反对派或地方力量“捕获”为代理人。<sup>③</sup>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为规避在中东地区发生直接、大规模常规战争的风险，转而

---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2020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Graduation Ceremony,” White House, June 13,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2020-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graduation-ceremony/>; 张帆：《战略收缩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进退得失》，载吴白乙、倪峰主编：《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260页。

② Will Marshall, “Drones, Disinformation and Proxies: What the Middle East’s ‘Forever Wars’ Tell us about the Future of Conflict,” Global Risk Insights, February 14, 2022, <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22/02/drones-disinformation-and-proxies-what-the-middle-east-s-forever-wars-tell-us-about-the-future-of-conflict/>.

③ 陈翔：《内战为何演化为代理人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29—32页。

采用间接、小型、非对称的冲突形式。同时，目标国内部派别为了争夺政治、经济和安全优势，主动或被动投靠外部力量。

中东地区已成为美国代理人战争的“试验场”，主要涉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脆弱国家”。<sup>①</sup> 例如，2006—2008 年，美军在伊拉克资助安巴尔部落“觉醒运动”民兵打击伊拉克“基地”组织；2011 年，美军从伊拉克撤离后，继续扶持伊拉克政府军、逊尼派部落武装遏制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拉克的代理人武装。又如，2011 年美国在利比亚支持反对派武装叛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颠覆了卡扎菲政权。同时，美国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已演变为“微型世界大战”（mini-World War）。<sup>②</sup> 2011 年至今，美国妄图通过资助叙利亚反对派的叛乱运动颠覆阿萨德政权，引发各方力量角逐。

2021 年以来，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情况下，美、俄等大国将注意力转向东欧，干预或介入中东安全事务的力度和迫切性下降，加之中东国家谋求增强自主性的愿望更强烈，以及中国在中东的积极斡旋，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促成中东出现“和解潮”。<sup>③</sup> 但是，“和解潮”的深化依然面临诸多结构性障碍。其中之一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仍具备干预中东秩序的强大能力和动机，其维系中东霸权的战略目标不会轻易被“和解潮”所改变。中东地区国家独立性的增强与美国继续以低成本维持其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形成矛盾。<sup>④</sup> 中东“和解潮”作为地缘政治的短期突变，尚不会实质性抵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反而会刺激美国改变传统的力量运用与资源组合方式，

---

① 关于“脆弱国家”的概念分析，可参见刘天旭：《脆弱国家研究的兴起：现状、原因及局限》，《国外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第 68—75 页；李因才：《从“失败国家”到“脆弱国家”：概念发展与政策演变》，《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48—58 页。

② Amir Taheri, “A global struggle finds its battlefield in Syria,” *The Times*, July 18, 201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a-global-struggle-finds-its-battlefield-in-syria-dm6wm6zkjtf>; Liz Sly, “A mini world war rages in the fields of Aleppo,”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4,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a-mini-world-war-rages-in-the-fields-of-aleppo/2016/02/14/d2dff02-d340-11e5-a65b-587e721fb231\\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a-mini-world-war-rages-in-the-fields-of-aleppo/2016/02/14/d2dff02-d340-11e5-a65b-587e721fb231_story.html).

③ 参见孙德刚、章捷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和平与发展》2023 年第 2 期，第 30—35 页。同时，一些学者也将美国介入俄乌冲突的方式视为代理人战争，参见杨光海：《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动因、举措与启示》，《和平与发展》2023 年第 1 期，第 24—42 页；陈翔：《俄乌冲突与美国代理人战争的走向》，《国际关系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43—60 页。

④ 金良祥：《中东国家新一轮关系缓和探析》，《国际关系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49—150 页。

并将运作复合代理人战争作为塑造中东格局和护持地区霸权的一种补充和替代方案。

结合既有概念和中东地区冲突形态的演变,<sup>①</sup> 本文倾向于从广义角度理解“代理人战争”(Proxy War),它是外部施动方(Activators)操纵各种类型的代理人(Agents),包括国家、非国家武装、私营军事公司、虚拟与智能化行为体等,试图以间接、低成本、低能见度的方式介入并影响目标国正在进行的冲突,以实现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的军事行动。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与冷战时期的传统代理人战争已然不同,<sup>②</sup> 学界尚未对这一现象和问题进行充分讨论。<sup>③</sup> 美国不断翻新军事力量的运用方式和作战理念,将不同类型的非常规力量投入动态的委托—代理结构中,进而介入多种安全议题交织的多维冲突空间,形成复合化的中东代理人战争形态。其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美国与当地代理人进行资源交换,显著提升战斗效能,模糊传统代理人战争的概念边界,形成并肩作战的混合模式;二是美国与中东代理人形成网络化代理关系,其中每个“节点”都可能扮演复杂多变的角色,提升了力量组合的灵活性与韧性;三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美军在中东的作战场景和方式,“网络代理人”和“智能代理人”被

① 关于代理人战争的代表性概念探讨,可参见 Karl W. Deutsch,“External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Wars,” in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102; Osmáńczyk Jan Edmund, *Encyclopedia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bingdon: Routledge Books, 2002, p.1869; 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pp. 5, 11-13;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 1. 关于国际冲突形态演变的探讨,可参见左希迎:《非常规战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78—101页。

② 关于传统代理人战争的探讨,可参见 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Tyrone L. Groh, *Proxy War: The Least Bad Op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第124—155页。

③ 既有研究多为聚焦美国与地区大国互动或具体战场的案例研究,可参见陈翔:《霸权护持与美国的代理人战略》,《当代亚太》2020年第1期,第51—57页;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115—138页;Vladimir Rauta,“Proxy Warfare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Take Two,” *The RUSI Journal*, Vol. 65, No. 2, 2020, pp. 6-9; Hino Samuel Jose and Laode Muhammad Fathun,“US-Iran Proxy War in Middle East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Issues*, Vol. 3, No. 1, 2021, pp. 36-48.

引入该地区的多维战争空间，成为美国的高科技“爪牙”；四是中东安全市场化现象显现，私营商业武装日益介入中东的广泛冲突，扮演辅助美军作战的“前线代理人”。本文拟全面探讨美国推动中东代理人战争复合化的内在逻辑和方式，以期对学界深化对美国中东战略调整趋向的认识提供参考。

## 一、打破边界：美国与中东代理人的交互化

间接作战是传统代理人战争的关键特征，往往被视为代理人战争与常规战争的概念边界。例如，芒福德（Andrew Mumford）将代理人战争定义为希望影响战略结果的第三方在冲突中的间接参与，认为间接方式（indirect approach）是一切代理人战争的标签。<sup>①</sup>这意味着施动方（通常指国家行为体）与代理人的行动范围是严格分开的，即施动方利用代理人实现目标时处于武装冲突范围之外。间接干预是概念层面的机械划分，其隐含着“施动方中心论”的逻辑，并不能真实呈现代理人战争交互化特性。正如福克斯（Amos C. Fox）所指出的，把施动方与代理人分开的理论错误地理解了现代代理人战争，实际上并非如此，“使用代理人的行为体通常沉浸在武装冲突中，与其代理人在一起”<sup>②</sup>。具体到美国，其在中东进行反恐、反叛乱、政权颠覆等多任务代理人战争时，常以复合方式进行。<sup>③</sup>这与传统代理人战争不同，即美国正在将代理人战争的传统模式转化为交互模式。

第一，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形态是一幅不断变化的“光谱”<sup>④</sup>

---

①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UK: Polity Press, 2013, p. 1, pp. 21-24; Andrew Mumford, “The New Era of the Proliferated Proxy War,” *Real Clear Defense*,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17/11/16/the\\_new\\_era\\_of\\_the\\_proliferated\\_proxy\\_war\\_112648.html](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17/11/16/the_new_era_of_the_proliferated_proxy_war_112648.html).

② Amos C. Fox, “Five Models of Strategic Relationship in Proxy War,” *Georgetown Security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2, 2020, p. 50.

③ Andreas Kriega and Jean-Marc Ricklib, “Surrogate Warfare: The Art of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Defence Studies*, Vol. 18, No. 2, 2018, pp. 115-116.

④ 休斯认为，代理人战争通过补充和替代两种方式减少直接介入的深度，代理人不必独立完成全部任务。杜奈尔也指出，间接干预是让别人全部或部分地完成工作。代理人可以与施动方并肩作战，并不一定像传统代理人那样取代施动方的全部军事能力，有时可能只是对现有能力的补充。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pp. 1-2; Bertil Duner, “Prox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18, No.4, 1981, p. 353.

(spectrum)。为适应不同作战场景（如平叛、反恐、政权更迭等），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与常规战争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尽管由中东地方代理人完全代替美军行动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美国的风险和成本，但若缺乏美军的“伴随式”辅助，当地代理人独立开展复杂、危险战斗任务的效能将受到制约。因此，美国在实际运作中找到一种平衡办法，即与中东地方代理人进行资源（包括人力、情报、武器、后勤等）交换，在提升后者作战效能的同时，也确保自身的能见度和参与度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并不违背代理人战争“负担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burden）的基本逻辑和间接作战属性。正如拜曼（Daniel Byman）所言，“代理人战争是一个光谱”，太多的直接军事支持实在不算什么代理人战争，但较低的参与范围依然在代理人战争的光谱中，“代理人战争是指一个大国在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中起主要的支持和指挥作用，而在实际的战斗中只起很小的作用。”<sup>①</sup>

第二，倚重当地代理人的非对称优势是美国进行交互作战的重要原因。不同的代理行为体（个人或组织）有各自擅长的领域，这使得其从事某项活动比委托人更有效率。<sup>②</sup>在代理人战争中，代理人天然具有主场优势，更了解当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人口结构、地形地貌、关键基础设施等信息，同时更熟悉当地事务和社会网络的运作，这种天然的非对称优势使之更适合在当地帮助美国去做那些不便出面、不擅长的事情，降低后者“事必躬亲”的昂贵成本。尽管美国社会早已厌倦了美国政府对中东长期大规模用兵，但公众经常漠视美国决策者通过当地力量进行军事干预，只要不向国内征兵或导致伤亡，民众一定程度上甚至支持这么做。<sup>③</sup>因此，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寻求地区盟伴协助美军继续作战。巨大的实力差距及“主从”关系结构并不影响各方的非对称优势互补和实现精准合作。

---

<sup>①</sup> Daniel Byman, “Approximating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8, No. 157, 2018, p. 12.

<sup>②</sup> Daniel Byman and Sarah E. Kreps, “Agents of Destruction? Applying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to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1, No. 1, 2010, p. 3.

<sup>③</sup> Candace Rondeaux and David Sterman, “Twenty-First Century Proxy Warfare: Confront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New America*, February 2019, [https://d1y8sb8igg2f8e.cloudfront.net/documents/Twenty-First\\_Century\\_Proxy\\_Warfare\\_Final.pdf](https://d1y8sb8igg2f8e.cloudfront.net/documents/Twenty-First_Century_Proxy_Warfare_Final.pdf).

美国将借助中东当地代理人的非对称优势视为创新作战的一部分。前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沃特尔（Joseph Votel）和克拉弗利（Eero Keravuori）认为，缺乏解决地方性冲突的能力和资源，可能会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因此美国军方必须协调各种类型的代理人采取共同行动。<sup>①</sup> 安德烈斯（Richard B. Andres）等学者系统论述了所谓“阿富汗模式”的创新性、优势及应用潜力。他们认为，空军、特种部队和本土代理人部队形成的军力组合，降低了美军的生命代价和经济成本，如果使用得当，“阿富汗模式”将为美国海外干预提供战略优势。<sup>②</sup>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指出，美国已经制定了一套精准服务于阿富汗战场的战略，能以相对较少的地面人力投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种作战形态正是美国设想中的国防转型。<sup>③</sup>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1 年 8 月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很大程度上说明“阿富汗模式”不过是美国运作代理人战争的失败案例。

第三，中东地区日益成为美军与当地代理人交互作战的实验场。为规避风险并提升代理人的作战效能，美军与当地代理人频频进行交互作战行动。从 2011 年开始，美国在中东战场大力采取“地面为主，空中为辅”的干预行动，这种交互作战如同“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被称为“平行代理人战争”<sup>④</sup>（parallel proxy warfare）。<sup>⑤</sup> 美国将“空中干预”模式与地面代理人的战斗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脱离地面实际冲突”，避免了重大伤亡风险。<sup>⑥</sup> 例如，在伊拉克战场上，“小而精”的美国特种部队与伊拉克安

---

① Joseph Votel and Eero Keravuori, “The By-With-Through Operational Approach,” *Joint Forces Quarterly*, No. 89, 2018, pp. 40-47. 例如，2001 年 12 月“基地”组织残余逃到阿富汗普什图族控制的托拉博拉山区，美军原本准备深入追击，但并不熟悉那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最终其招募了一支“普什图联军”（被美国称为“东方联盟”）作为代理人来帮助自己，“普什图联军”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魏骅译，华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8—289 页。

② Richard B. Andres, Craig Wills, and Thomas E. Griffith Jr., “Winning with Allies: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Afghan Mode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2005, pp. 124-127.

③ [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第 291 页。

④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UK: Polity Press, 2013, p. 25.

⑤ 牛新春：《美国中东政策：开启空中干预时代》，《西亚非洲》2017 年第 1 期，第 14—22 页。

⑥ 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 *Conflict, Security &*

全部队、安巴尔部落民兵交互在一起，高效地镇压了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叛乱。<sup>①</sup> 曾在前线服役的前北约军官艾恩（Richard Iron）认为，只有“把地方人力与我们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赢得实质性胜利。<sup>②</sup>

总之，美国在中东进行的代理人战争呈现交互化特点，即美军与当地代理人根据各自的角色和优势来综合权衡武装介入的深度、规模和组合形式，以分工协作、资源互补的方式参与冲突，这是相互赋能的过程。美国通过与代理人的交互作战打破传统代理人战争的边界，增强了作战效能。

## 二、灵活与韧性：美国中东代理关系的网络化

为适应中东多种作战场景，美国与当地代理人之间发展出不同长链代理关系，而这些多级控制链交织在一起，构成复合化的代理关系网络。美国在该网络中扮演“中枢神经”角色，推动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行为体按照不同议题自由组合，帮助美国以更灵活、更具韧性的方式运作中东代理人战争。

### （一）更复杂的授权链

从结构上看，代理关系存在“短链”和“长链”模式。“短链”模式是一种短距离的代理关系，而“长链”模式是指“源头”施动方与“终端”代理人之间存在多级中间行为体，拉长了授权链的距离。而且，这些中间行为体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代理人又是施动方，其角色存在变化的空间。在现实情形中，美国更倾向于利用复杂设计的“长链”模式来运作中东代理人战争。

第一，“短链”模式的结构过于简单、直接，其功能受到限制，几乎无法应对复杂的战争环境。美国在中东面临多重战争任务，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颠覆政权、遏制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力等。在打击不同对手、实现不同目标的过程中，美国面对的作战场景是复杂、变化的，所需要的资源和手段也要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为应对中东复合化的冲突形态，美国积极整合具有不

---

*Development*, Vol. 2, No. 2, 2002, p. 33.

① 文少彪：《利益、信息与偏好：美军与安巴尔部落镇压叛乱的代理人战争》，《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第65—72页。

② Richard Iron, “The Charge of the Knights: The British in Basra, 2008,” *The RUSI Journal*, Vol. 158, No. 1, 2013, p. 62.



同专业优势、功能和资源的战斗单元，努力促成多种力量协同作战模式。在此基础上，美国要将大小不一、类型各异的上下游战斗行为体整合到其主导的中东议程中。在此情形下，“短链”模式难有作为，发展由多个“长链”交织的代理关系网络成为美国的选择。美国作为“源头”施动方，可以更便利地操纵各条“长链”，实现远距离微调代理人网络运行的目标。例如，美国拉拢海湾国家、约旦和埃及，以形成松散的“中东战略联盟”，并通过操纵“中东战略联盟”这一中间架构来间接影响地区盟友及其当地代理人的行动，有效实现打击恐怖主义、遏制伊朗、对抗俄罗斯、保障其油气供应和战略通道安全等目标。<sup>①</sup>

第二，“长链”模式有利于隐藏代理关系，降低施动方与代理人的风险。为绕开复杂、低效的官僚系统，减少公众关注，美国决策者通常授权特殊的“影子部门”去执行与中东代理人战争相关的各种项目，如中央情报局深度“运作”了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叛乱。2017—2020 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127e 计划”（127-echo program），美国特种部队与非正规力量合作在中东、非洲、亚太等地区共执行了至少 23 个独立、低调的代理人战争项目，美国国会、国务院和公众知之甚少，监督与问责缺位导致“影子部门”的自主性扩张。<sup>②</sup> 但是，美国“影子部门”的能力、资源有限，需要发展并依靠下一级代理人去执行各类任务，最终会形成以自己为中枢的复杂代理关系网络。在这个结构中，授权链两端的距离被拉大，以至于执行任务的中东地方代理人不确定终极运作方是谁。美国在中东运作“长链”代理人网络，加大了获得证据的难度，有利于美国决策者推诿责任和规避风险。

同时，“长链”授权也有利于降低代理人的风险。在反美情绪强烈的中东国家，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合法性和支持度，地方力量通常不希望被视为美国的代理人。<sup>③</sup> 为了避免相互牵连，美国与中东代理人巧妙地掌控代理关

---

①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 期，第 65—66 页。

② Nick Turse and Alice Speri, “How The Pentagon Uses a Secretive Program to Wage Proxy Wars,” *The Intercept*, July 1, 2022,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7/01/pentagon-127e-proxy-wars/>.

③ 2002 年，卡尔扎伊试图获得美国的授权允许其威胁动用美军来迫使不合作的普什图军阀帕扎·可汗·扎德兰投降，但这会使得卡尔扎伊被视为“美国的爪牙”，在政治上对卡

系，试图发展“长链”代理关系网络吸纳各类“介质”行为体，使之按照特定的规则来推进间接控制的传导过程，从而达到淡化甚至隐藏代理关系的效果。美国“影子部门”根据中东的作战任务和资源需要，进一步发展出二级、三级甚至多级代理人，最终衍生出由多条“长链”控制的地区代理关系网络。

第三，代理关系网络在结构上更具韧性。相对于简单的线性代理关系，在更为立体的代理关系网络中，即便其中某个代理“节点”退出或无法工作，也不会使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进程瘫痪。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美国中情局多年的权力滥用，导致其海外代理人战争项目遭到国会冻结。但是，沙特随后发起了一个名为“狩猎俱乐部”（Safari Club）的组织（成员包括摩洛哥、埃及和法国等），继续在非洲推动代理人战争。对此，沙特前情报局长费萨尔（Turki al-Faisal）回忆道，“沙特与这些国家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维护了世界的安全，而当时的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sup>①</sup>又如，2017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了中情局主导的以颠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为目标的代理人战争项目，但是沙特、土耳其等国仍在美国名义上缺位的情况下向叙反对派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即由代理关系网络中的其余成员继续推动反阿萨德的代理人战争。

## （二）更灵活多变的组合

美国与中东代理人不再按照“一对一”的传统方式进行互动，而是共同嵌入一个多元行为体构成的代理关系网络中。代理关系网络化导致卷入其中的行为体可以拥有多变的角色，加剧了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不确定性。

第一，在中东代理人战争中，施动方往往不是美国单个国家，而是一个阵营。尽管美国有强大的军力投送、后勤支持和海外前沿军事基地网络，能够独立支撑中东代理人战争，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地区盟友加入其中，则可以分摊作战成本和实现资源互补。而中小国家在能力不足和存在对手威胁的情况下也经常被迫或主动加入美国主导的施动方阵营，这是因为代理人战略

---

尔扎伊和美国都不利。[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第292—293页。

<sup>①</sup> M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U.S. Relies Heavily on Saudi Money to Support Syrian Rebel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1/24/world/middleeast/us-relies-heavily-on-saudi-money-to-support-syrian-rebels.html>.

“非常适合那些相对于对手处于战略劣势的国家，或者那些发现直接挑战对手的成本非常高的国家。”<sup>①</sup> 在中东的大部分冲突中，美国与其他施动主体几乎不再单打独斗，而是在共同威胁或利益驱动下形成议题式阵营，共同为特定的议题投入资源，并协调代理人采取集体行动。例如，在叙利亚内战中，美国、部分欧洲国家、土耳其、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形成了一个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松散阵营，而俄罗斯、伊朗等则联手支持阿萨德政权，最终形成了以美、俄主导的两大施动方阵营。<sup>②</sup>

第二，在中东的代理关系网络中，非国家行为体扮演多重角色。在中东，“大国冲突往往转化为较小的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冲突，这种变化导致了持续的混乱状态，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成为地区代理人战争前线的‘走卒’。”<sup>③</sup> 前美国陆军上校葛雷曼（Jan K. Gleiman）认为，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代理人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在未来的冲突中将充满次国家和非国家武装组织，将这些行为体纳入代理人战争在军事上是必要的，应使其成为美国大战略的一部分。<sup>④</sup> 2018 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第 1202 条首次明确，为“参加非正规战争的外国部队、非正规部队、团体、个人”提供支持。<sup>⑤</sup>

在中东的“脆弱国家”，中央政府对其国家领土和人口缺乏有效治理，导致一些非政府主体填补了权力真空。<sup>⑥</sup> 如“基地”组织可以像国家行为体

---

① Erica D. Borghard, “Arms and Influence in Syria: The Pitfalls of Greater U.S. Involvement,” Cato Institute, August 7, 2013, [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34\\_web\\_1.pdf](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34_web_1.pdf).

② 在也门内战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阵营化代理人战争，美国向沙特主导的海湾联盟出售先进导弹和防空系统，并辅以情报、培训、空中加油和设备维修等服务，形成美国“幕后领导”的以扶植哈迪政府为目标的施动方阵营，而伊朗主导的什叶派联盟则成为支持胡塞武装的施动方阵营。参见朱泉钢：《从治理危机到代理人战争：也门冲突的流变轨迹与安全困境》，《中东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60—80 页；Katherine Zimmerman and Nicholas A. Heras, “Yemen has Become an Iranian Proxy War Against Israel,”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4,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24/yemen-houthi-uae-israel-iran-abraham-accords/>.

③ Sean McFate, *The New Rules of War: Victory in the Age of Durable Disord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19, pp. 25-42, 244-248.

④ Jan K. Gleiman, “The Future of War is Here: Proxy Warfa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4, 20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the-future-war-here-proxy-warfare-11546>.

⑤ U.S. 115th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8,” November 9, 2017, <https://www.congress.gov/115/crpt/hrpt404/CRPT-115hrpt404.pdf>.

⑥ Robert Malley, “The Unwanted Wars Why the Middle East is More Combustible than Ever,”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6, 2019, pp. 38-46.

一样发展自身的代理人，用金钱收买私人武装，通过代理人战略介入冲突。“基地”组织曾在叙利亚建立“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后者以次级代理人方式参与到反阿萨德的运动中。而“努斯拉阵线”除了亲自战斗，也会购买雇佣兵的军事服务，“未来，‘圣战分子’可能会利用特种雇佣部队进行精确恐怖袭击。”<sup>①</sup>与此同时，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既是施动主体，同时又是代理人。例如，在特定时期，黎巴嫩真主党既是伊朗和叙利亚的代理人，同时也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发展受它控制的代理人网络。

第三，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代理关系网络中可能存在多头代理模式，即同一个代理人与多个不同的施动方建立代理关系。如黎巴嫩真主党在一段时期内与叙利亚、伊朗都建立了代理关系。从代理人的角度讲，黎巴嫩真主党占有私人信息优势，并具备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其谋求多方赞助并非不可能，这是它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从美国的角度讲，物色和操纵可靠且有能力的中东代理人并非易事，因为后者可以利用自己的非对称优势去寻求多方庇护。当然，多头代理模式的运作难度较大，特别是当代理人接受美国与其他施动方相互冲突的指示时，这会导致代理人无所适从。同时，当美国与其他施动方发现多头代理关系，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

总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当地代理人根据相互交织的议题进行内外勾连，推动中东代理关系网络化，导致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呈现“长链”控制、阵营化、多头代理等形态。美国借助网络化的代理关系支配资源，增强其干预中东事务的灵活性与韧性。

### 三、虚拟与智能力量的引入：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高科技化

冷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扩散改变了战争形态，快速更新了传统的作战方式和思维。<sup>②</sup>过去十多年，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日益

---

<sup>①</sup> Sean McFate, *Mercenaries and War: Understanding Private Armies Toda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4.

<sup>②</sup> Christopher Coker, *Warrior Geeks: How 21st Century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Way We Fight and Think about War*,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Warren Chin, “Technology, War and the Sta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4, 2019,

转化为作战效能，并极大地拓展了战争空间，地理与虚拟空间的冲突相叠加，促进美国将“高科技代理人战争”引入中东战场。

### （一）代理人战争虚拟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博弈的新领域。十年前，芒福德曾准确预测网络战可能演变成代理战争模式，即有时威胁会以字节形式出现，而不是传统的“地面代理人”（boots on the ground），“在 21 世纪，由代理服务器进行的战争可能比传统上设想的由代理部队进行的战争更多。”<sup>①</sup> 为了配合地缘政治议程，对手之间秘密招募黑客组织，或通过机器学习技术驯化“数字代理人”等，这极大增强了网络攻击能力。随着美国大量引入“字节代理人”（byte proxy），中东代理人战争的虚拟化进程加快。

第一，网络空间成为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新场域。近十年来，网络空间逐渐演化为大国博弈场，网络战成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推进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抓手。因此，部分国家主动或被迫加大网络攻防资源的投入，利用网络代理人开展黑客攻击、信息窃取、舆论战等行动。毛瑞尔（Tim Maurer）认为，网络代理人（cyber proxies）指的是“在受益人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开展网络攻击或直接促成网络攻击的中间人”<sup>②</sup>。例如，美国通过设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支持办公室”（Office of Syrian Opposition Support），向叙反对派提供电脑设备、培训和技术援助，确保后者赢得网络舆论战。<sup>③</sup> 又如，在利比亚内战中，美国将网络空间博弈作为塑造利比亚冲突的一种补充性手段，利用“社交媒体巨魔”（social media trolls）和“推特机器人”（Twitter bots）等各类网络代理人，频繁制造虚假信息，试图左右网络舆论走向。<sup>④</sup> 可

---

pp.765-778.

①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The RUSI Journal*, Vol.158, No. 2, 2013, pp. 43-44.

② Tim Maurer, *Cyber Mercenaries: The State, Hackers,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xi.

③ Sean Lyngaas, “Syria’s Digital Proxy War,” *The Atlantic*, October 31, 2012,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10/syrias-digital-proxy-war/264309/>.

④ Frederic Wehrey, “‘This War is Out of Our Han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ibya’s Post-2011 Conflicts from Proxies to Boots on the Ground,” *New America*, September 14, 2020, <https://www.newamerica.org/international-security/reports/this-war-is-out-of-our-hands/>.

见，美国炮制的“混合的半自主字节代理人”（hybrid semi-autonomous byte proxy）已在网络空间扮演塑造冲突叙事的角色，成为“集成武器系统”的一部分，并且与地面代理人一样发挥重要作用。<sup>①</sup>

第二，美国推动中东代理人战争虚拟化，提高了追责难度，加剧了网络安全困境。当各国在发展和应用网络进攻能力时，往往面临法律和声誉方面的风险、冲突升级失控以及技术资源缺失的掣肘。为规避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将网络战任务外包给私人技术组织，进而将后者转化为“虚拟代理人战争”的工具。<sup>②</sup> 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匿名性和溯源的高技术门槛，共同决定了追责难度。由于美国具有压倒性的网络战优势，当其动员以色列的网络代理人率先向伊朗等对手发动攻击时，往往能夺取攻防主动权，而后者则需付出较高成本开展归因溯源。即便美国、以色列被伊朗推断为网络入侵者，但在经过精心设计的虚拟化代理关系掩护下，美、以仍可进行“貌似合理的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sup>③</sup> 中东地区的受害者在网络战追责问题上则倾向于持模糊态度，不愿或没有确切的证据链来证明美国在网络空间构建的复杂虚拟代理关系，避免遭到美国的更多报复。

## （二）代理人战争智能化

近十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器学习等前沿科技的发展，自主或半自主武器的军事应用价值大幅提升，并被引入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场景，强化了美军的精准打击、态势感知等能力，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生命代价等。此外，美国总统通过行政令来实施无人机作战行动，绕开了国会的审查和民众的关注，扩大了白宫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自由裁量权。<sup>④</sup> 尽管美

---

<sup>①</sup> Aris Roussinos, “Anarchy is Coming,” *UnHerd*, March 22, 2021, <https://unherd.com/2021/03/anarchy-is-coming/>.

<sup>②</sup> 杨楠：《网络空间军事化及其国际政治影响》，《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78—79页。

<sup>③</sup> 例如，2010年7月，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制的“震网病毒”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了精准打击，导致纳坦兹铀浓缩工厂约1/5的离心机报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进攻性的网络威慑战略，加剧了网络空间的攻防失衡。张耀、许开轶：《攻防制衡与国际网络冲突》，《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第117—120页；江天骄：《全球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及其成因》，《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2期，第149—151页。

<sup>④</sup> Jack Goldsmith and Matthew Waxman, “The Legal Legacy of Light Footprint Warfa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9, No. 2, 2016, pp. 7-21.

国有强烈动机运用无人机参与广泛的中东冲突，但这会带来一系列不可控风险，包括降低武力使用门槛，增加追责难度，纵容智能武器扩散，甚至改变国家和叛乱团体在中东作战的方式，成为中东安全秩序的持久隐患。<sup>①</sup>

第一，无人机等“智能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成为美军在中东作战的“鹰爪”。在中东的冲突中，无人机这类智能武器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正在部分代替或辅助人类作战，进而更新了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形态。一方面，美国在中东运用无人机进行远程“定点清除”，提升了威慑对手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无人机也被广泛用于辅助美国的中东地面代理人开展行动，增强其作战能力。<sup>②</sup>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无人机已成为美国介入中东安全事务、推动反恐战争以及遏制伊朗影响力的利器。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利用无人机辅助地面部队反恐，无人机在对恐怖分子展开“系统性空袭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up>③</sup> 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利用无人机开展反恐行动、遏制伊朗“地区扩张”的决心更强烈，并进一步放松和简化了对无人机袭击的管制，使得无人机成为特朗普政府对伊全方位“极限施压”的重要抓手。<sup>④</sup> 在特朗普政府初期，美军每 4 天就在中东对目标进行一次无人机打击，其频率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 10 倍。<sup>⑤</sup> 2020 年 1 月，美军利用无人机杀害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将军，此次行动再次表明美国在中东采取“稳、准、狠”的低成本作战方式的意图。<sup>⑥</sup> 拜登执政后，尽管美国

---

① Jonathan Burden, “Will Drones Push the Middle East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Global Risk Insights*, November 24, 2019, <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19/11/will-drones-push-the-middle-east-past-the-point-of-no-return/>.

② [美] 保罗·沙瑞尔：《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朱启超、王姝、龙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年版；Roderic K. Butz, “Beneath the Crosshairs: Remotely Piloted Airstrikes as a Foreign Policy Tool,”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1, 2021, pp. 36-48.

③ “President Obama: ‘We will Degrade and Ultimately Destroy ISIL,’”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0,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4/09/10/president-obama-we-will-degrade-and-ultimately-destroy-isil>.

④ James Rogers, “Drone Warfare: The Death of Precis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 12, 2017, <https://thebulletin.org/2017/05/drone-warfare-the-death-of-precision/>；余纲正、罗天宇：《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偏好及安全影响》，《国际政治科学》2022 年第 2 期，第 69—72 页。

⑤ Micah Zenko, “The (Not-So)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Trump’s Drone Strikes Outpace Obam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 2017, <https://www.cfr.org/blog/not-so-peaceful-transition-power-trumps-drone-strikes-outpace-obama>.

⑥ 张帆：《超越地区霸权？——试析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转型》，《美国

减少了无人机空袭次数，但实际上正陷入无人机作战模式的路径依赖，尤其是美国撤出阿富汗战场后，美国在中亚和海湾地区布局了更多的无人机力量，以确保其具备持久干预地区安全事务的能力。<sup>①</sup>

第二，“无人机+代理人”模式服务于美国中东作战理念转型。近十年来，美国决策者始终在思考如何在摆脱中东战略陷阱的同时，仍保有相应的战术手段干预地区事务。美国在综合考虑海外大规模军事部署的高昂成本和技术发展的溢出效应后，逐渐转向轻度、间接、灵活的军事干预模式，远程战争作为一种“远程对抗威胁的方法”随之兴起。<sup>②</sup>但是，由于美国距离事发地太远，其面临军力投送、后勤和时效性等极大挑战。在中东，美国通过运作小型、机动和隐蔽的“柔性”军事基地，推动了其军力部署前沿化和低成本化，有效提升了美军资源投送能力和应对非对称威胁的能力。<sup>③</sup>

美国决策者已将远程战争思维扩展到“远程代理人战争”（Remote Proxy Warfare）。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部署大量无人机，将其视为“高力量倍增器”（high force multiplier）。同时，美国在该地区扶植地方代理人，使之成为代替美国行动的地面代理人，无人机与地面代理人组合到一起，共同服务于美国在中东的“中等足迹战略”（medium-footprint strategies）。<sup>④</sup>在中东的冲突中，美军将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作为无人机与地面代理人的协同作战中心，发挥其后勤供应、靠前指挥和监督当地代理人的优势。美国运用智能化军事资源辅助当地代理人进行地面战斗，是一种智能战力与当地代理人相结

---

研究》2021年第5期，第43页。

① “US Military Strikes Fell 54% in Biden's First Year Compared to Trump's Last,” *Military*, December 27, 2021, <https://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21/12/27/us-military-strikes-fell-54-bidens-first-year-compared-trumps-last.html>; Jeremy Scahill, “The Mysterious Case of Joe Biden and the Future of Drone Wars,” *The Intercept*, December 15, 2021,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12/15/drone-strikes-joe-biden-pentagon-kabul/>.

② Jack Watling and Namir Shabibi, “Defining Remote Warfare: British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mes in Yemen, 2004-2015,” Remote Warfare Programme, Oxford Research Group, June 2018, <https://www.saf-erworld.org.uk/resources/publications/1312-defining-remote-warfare-british-training-and-assistance-programmes-in-yemen-2004-2015>.

③ 孙德刚：《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与调整趋势研究》，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第56—61页，179—185页。

④ Matthew Cancian, “What's the Buzz about Drones? 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 Modern War Institute, August 15, 2021, <https://mwi.usma.edu/whats-the-buzz-about-drones-evolutionary-not-revolutionary/>.



合的远程代理人战争模式。<sup>①</sup>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其中东的常规军事力量将进一步减少，但同时寻求增加无人机系统的部署，试图利用无人机赋能当地代理人，进而弥补、创新其地区军事干预能力。例如，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到 2023 年已在中东重要海域部署了 100 多架无人机，以监视中东地区的海上“非法活动”，尤其是遏制伊朗向胡塞武装在内的地区代理人运送武器的行动。对此，美国海军中东司令库珀（Brad Cooper）指出，无人机系统是弥补美国和当地合作伙伴能力缺口的唯一途径。<sup>②</sup> 随着美军在中东加大投入智能化军事资源，“无人机+代理人”作战模式将更加流行。

第三，智能化代理人战争在中东扩散，导致美国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美国在中东滥用无人机，这对伊朗、以色列以及胡塞武装、“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地区行为体产生了负面效应，加速了无人机作战方式的扩散，使得中东地区沦为“全球无人机战争的重要试验场”。<sup>③</sup> 一旦地区代理人掌握了智能作战装备的操作，其精准、隐蔽打击的能力将显著增强，进而反噬美军及其地区盟友的安全。例如，伊朗为遍布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的代理人提供“自杀式无人机”，对抗竞争对手。<sup>④</sup> 近年来，美国多次指控伊朗操纵代理人对美军驻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军事基地以及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实施无人机袭击。<sup>⑤</sup> 面对这一挑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

---

① 例如，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中，美国在该国东北部开辟了多处小规模特种部队基地，便于靠前操作无人机从空中辅助其代理人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发起地面进攻，取得了显著的作战效果。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 年）》，《西亚非洲》2022 年第 4 期，第 115—138 页。

② “US Navy Turns to Sea Drones in MidEast,” *Al-Monitor*, February 23,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2/us-navy-turns-sea-drones-mideast#ixzz7OGrl6lME>.

③ 朱泉钢：《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应用及其安全影响》，《西亚非洲》2022 年第 5 期，第 109—134 页。

④ Hafed Al-Ghwell, “How High-tech Proxy Wars Threaten the Global Order,” *Arab News*, January 30, 2021,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801071>; Sam LaGrone, “U.S. Navy Says Explosive Drone Attack Killed Two on Merchant Tanker,” *USNI News*, July 31,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07/31/u-s-navy-says-explosive-drone-attack-killed-two-on-merchant-tanker>. 关于伊朗与黎巴嫩、伊拉克、也门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赞助—代理”关系的深入分析，参见刘中民：《地区大国代理人战略的差异性研究——以中东宗教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22 年第 5 期，第 48—84 页。

⑤ Eric Schmitt and Jane Arraf, “Iran’s Proxies in Iraq Threaten U.S. with More Sophisticated Weapons,”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04/world/middleeast/>

麦肯齐（Kenneth McKenzie）曾表示，无人机“为对手提供了监视和打击美国和合作伙伴军事设施的能力，既允许合理的推诿，又能得到不成比例的投资回报”，同时美国缺乏可靠的网络化能力来对抗它们，无人机成为自伊拉克战场简易爆炸装置出现以来最令人担忧的技术发展。<sup>①</sup>

总之，信息与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安全领域渗透，正在改变中东代理人战争场景。美国将科技霸权转化为干预中东国家的工具和能力，运用虚拟和智能化代理力量对地区对手进行“降维打击”，在广泛的冲突中形成了失衡的攻防态势，有恃无恐地将中东代理人战争从地理空间推进到多维空间。

#### 四、商业武装介入：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市场化

经历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挫败，美国两党都不支持美国政府在中东做更多的事情。<sup>②</sup>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逐渐放弃以大规模军事力量塑造中东秩序的设想，并将视线转向“安全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security）。近年来，包括私营军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PMCs）在内的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安全领域，使该领域的权力结构日益呈现“公私混合”特点。<sup>③</sup> 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冲突中，美国引入了私营商业武装，使这类武装成为协助其开展代理人战争的“力量倍增器”，导致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特征。

第一，美国在中东大幅缩减常规军力，私营军事公司成为一股补充力量。

---

iran-drones-iraq.html; Lolita C. Baldor and Robert Burns, “Officials: Iran behind Drone Attack on US base in Syria,” Associated Press News, October 26,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middle-east-iran-syria-lebanon-tehran-e4410d13c73f45128d9d3a09e5b8e81d>.

① “General Kenneth F. McKenzie Jr. Middle East Institute Engagement,” U.S. Central Command, January 8, 2021, <https://www.centcom.mil/MEDIA/Transcripts/Article/2497526/general-kenneth-f-mckenzie-jr-middle-east-institute-engagement-feb-8-2021/>.

② Tyler Pager and Natasha Bertrand, “White House Shifts from Middle East Quagmires to a Showdown with China,” *Politico*, January 18,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1/28/biden-china-foreign-policy-463674>.

③ Anna Leander, “The Power to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3, No. 3, 2005, pp. 803-826; David N. Rose, “Army for Sale: The Rise and Ris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The Organization for World Peace*, May 29, 2019, <https://theowp.org/reports/army-for-sale-the-rise-and-rise-of-private-military-companies/>.

在战略上，中东对美国而言没有像过去 10 多年那么重要，美国一直缩减在该地区的驻军规模，这种趋势尽管“是渐进发生的，但是清晰的”<sup>①</sup>。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在海外的干预变得更加复杂和开放，其越来越依赖承包商将战争进行下去。<sup>②</sup> 在中东地区，为了弥补军力规模和能力上的缺口，雇用私营军事公司成为美军的选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将大量的军事服务外包给黑水国际（Blackwater Worldwide）、阿卡德米（Academi）等私营军事公司，利用它们在后勤保障、人员保护、街道巡逻、翻译、情报获取与分析等领域的专业化水平，辅助美军提升作战效率，同时降低战争的人力成本。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统计，在二战期间，仅有约 10% 的美国海外武装力量由私人承包。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海外武装力量私人承包比例已增长到 50%。<sup>③</sup> 截至 2020 年末，有 27 388 个私人承包商为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提供服务，这使美国意识到“承包商经济”的庞大规模以及美国对私营军事公司的依赖程度。<sup>④</sup> 在阿富汗，美国私营军事公司为阿富汗军队提供了训练、装备维护、情报获取、近距离空中支持等服务。美国前线服务公司（Frontier Services Group）董事长普林斯（Erik Prince）甚至向特朗普政府建议将阿富汗战争私有化，那样美国只需花费 50 亿美元即可将阿富汗作战任务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以替代成本高但效率低的美军地面部队。<sup>⑤</sup> 拜登执政后，美国加快落实阿富汗撤军计划，那些为美军提供

---

① Robin Wright, “The Shrinking U.S. Footprin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21,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our-columnists/the-shrinking-us-footprint-in-the-middle-east>.

② Kathy Gilsinan, “The War Machine is Run on Contracts,” *The Atlantic*, January 17,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1/us-contractors-and-hidden-costs-us-wars-iran/605068/>.

③ Moshe Schwartz and Joyprada Swain,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3, 2011, <https://sgp.fas.org/crs/crs/natsec/R40764.pdf>.

④ Tallha Abdulrazar, “Contractors and Mercenaries will Live on after the US Leaves Iraq and Afghanistan,” *Politics Today*, August 10, 2021, <https://politicstoday.org/contractors-and-mercenaries-will-live-on-after-the-us-leaves-iraq-and-afghanistan/>.

⑤ Tara Copp, “Here’s the Blueprint for Erik Prince’s \$5 Billion Plan to Privatize the Afghanistan War,” *Military Times*,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18/09/05/heres-the-blueprint-for-erik-princes-5-billion-plan-to-privatize-the-afghanistan-war/>; Karen De Young, Shane Harris and Dan Lamothe, “Erik Prince, in Kabul, Pushes Privatization of the Afghan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erik-prince-in-kabul-pushes-privatization>

服务的私营军事公司也随之退出阿富汗战场。<sup>①</sup>

第二，降低人力成本和政治风险是美国雇用私营军事公司的重要考虑。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问题愈演愈烈，增加了政府和国会进行战争动员的难度。与此同时，限制军队数量的政治必要性，意味着其在缺乏足够兵力或合适技能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军事外包。相较于正规军，私营军事公司受法律和战争规则的约束较小，因而可灵活地执行作战任务。<sup>②</sup> 正规军在目标国的战斗中如出现严重伤亡，可能引起国内民众的高度关注，这对决策者构成巨大的压力；而私营军事公司卷入战争被普遍视为“拿钱卖命”的灰色商业行为，其雇员伤亡情况往往被美国民众忽视，“这意味着总统可以有选择地利用承包商为其他目的服务”<sup>③</sup>。据估计，在“9·11”事件后的美国海外军事行动中，美国私营军事公司人员的死亡人数高达8 000人，高于美国正规军人的伤亡人数7 000人，其中超过3 800名私营军事人员在阿富汗战争中丧生，远高于美军的伤亡人数2 442人。<sup>④</sup>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美国私营军事公司倾向于从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招募人员。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报告，2018年为美国中央司令部服务的军事承包商的人员高达5万人，其中多达3万人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sup>⑤</sup> 然而，在美国官方的掩饰下，绝大多数私营军事公司的雇佣情况不透明，人员伤亡情况也未受

---

-of-the-afghan-war/2018/10/04/72a76d36-c7e5-11e8-b1ed-1d2d65b86d0c\_story.html.

① Jack Detsch, “Departure of Private Contractors was a Turning Point in Afghan Military’s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August 16,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8/16/afghanistan-military-collapse-private-contractors/>.

② Cyprian Aleksander Kozera, Paweł Bernat, Cüneyt Gürer, Błażej Popławski, and Mehmet Alper Sözer, “Game of Proxies—Towards a New Model of Warfare: Experiences from the CAR, Libya, Mali, Syria, and Ukraine,” *Security and Defence Quarterly*, Vol. 31, No. 4, 2020, pp. 77-97.

③ Kathy Gilsinan, “The War Machine is Run on Contracts,” *The Atlantic*, January 17,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1/us-contractors-and-hidden-costs-us-wars-iran/605068/>.

④ Ellen Knickmeyer, “Study: Pentagon Reliance on Contractors Hurt US in 9/11 Wars,” Associated Press News, September 14,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joe-biden-middle-east-business-afghanistan-taliban-3f66d407542879a95b26608eee08a07e; Isabel Debre, “Counting the Costs of America’s 20-year War in Afghanistan,” Associated Press News, April 30,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asia-pacific-afghanistan-middle-east-business-5e850e5149ea0a3907cac2f282878dd5>.

⑤ “Contractor Support of U.S. Operations in the USCENTCOM Area of Responsibility, to Include Iraq and Afghanistan (5A Papers),”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ustainment, July 2018, [https://www.acq.osd.mil/log/ps/.CENTCOM\\_reports.html/5A\\_July%202018\\_Final.pdf](https://www.acq.osd.mil/log/ps/.CENTCOM_reports.html/5A_July%202018_Final.pdf).

到外界重视，这为美国在中东开展商业化的军事干预开了绿灯。

第三，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客观上加剧了代理人战争的市场化。首先，美国引入商业代理人应对非对称安全博弈。在美国推进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什叶派“新月地带”扩大了地缘政治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俄罗斯严重依赖私营军事公司，这不仅为其提供了骨干战斗人员，而且提供了基础设施保护、情报、培训、后勤支持等安全服务，日益成为俄罗斯向中东投射影响力的绝佳工具。<sup>①</sup> 对此，美国战略界人士呼吁，美军必须做好应对私营军事公司的准备，在同等战术层面上应对商业武装代理人所构成的非对称威胁。<sup>②</sup> 可以说，引入商业武装代理人进行非对称安全竞争是美国应对中东战略收缩的一种方式。其次，“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肆虐也使美国更加重视利用私营军事公司。当美军从中东陆续撤离，极端势力则趁机从伊拉克西部向叙利亚扩张，并建立起横跨两国领土的“伊斯兰国”。美国不得不应对这一挑战，但又担心陷入新一轮反恐战争的泥潭。在两难之中，美国尤其依赖当地代理人网络的地面战斗，从而以“轻度介入”方式消除威胁。然而，在极端组织的攻势下，地方代理人武装普遍不堪一击。为此，美国国防部转向军事外包服务，雇用专业的私营军事公司为当地代理人“赋能”，包括提供后勤、情报、咨询、训练等各种形式的援助。

总之，为了应对在中东的战略收缩，美国发展军事外包模式，试图以“节支增效”的商业化思维运作代理人战争，增加作战主体的数量和类型，削弱

---

① 关于俄罗斯利用私营军事公司展开军事行动的探讨，可参见：Candace Rondeaux, “Decoding the Wagner Group: Analyzing the Role of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ntractors in Russian Proxy Warfare,” *New America*,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newamerica.org/international-security/reports/decoding-wagner-group-analyzing-role-private-military-security-contractors-russian-proxy-war-fare/executive-summary-key-findings>; Paul Stronski, “Implausible Deniability: Russia’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6/02/implausible-deniability-russia-s-private-military-companies-pub-81954>; Nathaniel Reynolds, “Russian Mercenaries in Great-Power Competition: Strategic Supermen or Weak Link?” *RAND Corporation*, March 9, 2021,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3/russian-mercenaries-in-great-power-competition-strategic.html>。

② Rodrick H. McHaty and Joe Moye, “The US Military must Plan for Encounters with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30/the-us-military-must-plan-for-encounters-with-private-military-companies/>。

了中东国家对战争的掌控能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战的方式、逻辑和规则。

## 结束语

近十年来，为应对大国竞争和中东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美国在中东进行持续的战略收缩，逐渐放弃利用大规模常规战争塑造地区秩序的设想，并转向利用复合代理人战争作为常规战争的补充和替代方案，继续在中东推动代价高昂且不便利的“肮脏”议程。从长期来看，美国在中东还会面临常规军事资源缩减、非传统安全威胁、非对称作战和战争空间拓展等多重挑战。对此，美国将继续搭建灵活、复杂的地区代理人网络。同时，美国竭力推动中东代理人战争的科技化、市场化，促进了“后现代代理人战争”（postmodern surrogate warfare）的兴起，淡化了“有形力量”的作用。<sup>①</sup> 美国的角色深刻改变了力量运用方式，催生了多维冲突，正逐步解构传统的中东安全秩序。

事实证明，美国作为代理人战争复合化的主要推动者，制造了一系列复杂而漫长的多维冲突，势必将引起难以控制的后果。美国与中东当地代理人的交互化显著加大了互相牵连的风险，既纵容了中东当地代理人的冒险和出格行为，也反噬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声誉。当美国试图将巨大的科技优势转化为中东的代理人战争效能时，却又无法掌握技术、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扩散路径。美国在中东地区引入商业代理力量，无异于打开了代理人战争市场化的潘多拉魔盒，极大降低了军事冲突的门槛，掩盖了潜在的混乱。

显然，美国将继续把推动代理人战争复合化作为其应对中东安全挑战和强化地区存在的一种战略方案，且该进程将不会有明确的终点和边界。这种态势的持续，将导致未来中东地区冲突的模式和进程更加难以控制。

[责任编辑：石晨霞]

---

<sup>①</sup> Will Marshall, “Drones, Disinformation and Proxies: What the Middle East’s ‘Forever Wars’ Tell us about the Future of Conflict,” Global Risk Insights, February 14, 2022, <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22/02/drones-disinformation-and-proxies-what-the-middle-east-s-forever-wars-tell-us-about-the-future-of-conflict/>.